

日 大塚丰·著

China

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 / (日) 大塚丰著; 黄福涛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1
ISBN 7-303-04828-6

I. 现… II. ①大… ②黄 III. 高等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4831 号

京权图字: 01—1998—2205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谢维和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15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30.00 元

序论 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形成史 研究的视点与方法

第 1 节 研究的构想与研究现状

1977 年 8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正式结束，而且提出了举国上下一致奋斗的新目标——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从此，中国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完全取决于教育能否培养出所需的人才，这就是教育受到重视的原因。从实现“四化”需要大量高级专门人才来看，在文革后的教育改革中，首当其冲的是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

会议召开仅 4 个月后的 12 月，国家打破常规（往年都在夏季），很快进行大学入学选拔考试，改变文革期间主要由单位推荐入学的不合常规的做法，恢复全国统一考试。1977 年考生达 5700000 人，录取新生 273000 人，平均竞争率为 20.9 倍。竞争激烈的原因是由于文革期间被剥夺考试机会的大量考生蜂拥而至造成的。此后，除 1978 年考生最多，达 6000000 人之外，逐年减少，相反入学率却逐年上升，1994 年录取者与考生的比例为 1:2.5。可以说，大学之门敞开了许多。其中原因之一是高等学校的数量不断扩大，例如，1982~1985 年每年高等学校数分别为 714 所、805 所、902 所和 1016 所，每年约增加 100 所院校。不过，与庞大的人口相比，上述增长仍微不足道。现实情况是，初等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更不用说中等教育了，进入全日制高等学校的入

学者占同一年龄人口的比例仅为 3.9% (1993 年)。在中国,大学生的确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

文革后,高等教育的变化,除了表现在数量上扩大之外,还表现在对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以实现高等教育质的转变。具体来看,高等教育的变化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改革因为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国家统一招生制度,除了国家计划招生之外,出现了企、事业等用人单位出资、委托大学培养大学生及自费生。

第二,扩大在校生规模的最大难题是,必须考虑增加占校园大部分面积的学生宿舍和其它生活设施,为了减轻这一负担,实行部分走读制。

第三,由于以往实行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造成国家需要与个人要求不一致,分配计划难以面面俱到,专业不对口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以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作为试点,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用人单位与毕业生事先就分配要求、条件等进行协商,毕业生自主选择工作岗位的做法。但是,在就业“自由化”的征兆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做过头的做法。在“有偿分配”的名义下,的确出现了将毕业生“商品化”、大学与企业等之间进行金钱交易的现象。

第四,改变以往学生入学后一律发放“助学金”的做法,对成绩优秀或某些特殊专业的学生颁发“奖学金”或“贷学金”。近年来,由于学生数量的增加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必要对所有学生一律给予资助。

第五,为了实现教育课程的多样化和弹性化,逐步实行学分制并开设选修科目。但是,这方面的改革步伐较为缓慢,而且只是处于局部试行阶段。

第六,文革中,受社会上蔓延的极端“平等主义”倾向影响,所有大学教师一律称为“教师”,职称长期冻结的现象得到改变。

1985年之后，有关部门重新研究教师任用及资格审查方法并制定了有关的法规。对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等不同的职称，在学历或工作年限等方面规定了明确的任职条件和职责，另一方面，采用新的聘任方法，一般以二年或四年的聘任制为主，取代以往实质上的终身雇佣制。

第七，建国初期开始，政府对高等教育实行中央集权的统一计划和管理，大学中的一切活动都置于极端的统一管理体制之下。1985年，中共中央在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阐述了改革的要点，明确提出“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此后，高等学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如上所述，改革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改革带来的变化却可简要概括为，摆脱了“高度集中”、“固定不变”、“国家计划”的模式，引进了以“市场原理”或“能力主义”为基础的“竞争机制”，追求教育的“多样性”、“效率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等。

目前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正如在“前言”中阐述的那样，如果不对各种制度或惯例的来龙去脉加以探讨，那么只能从表面上把握它们的变化。如果对目前的各种问题难以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那么对进行改革的主体来说，可能会作出轻率的选择和变革。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对建国初期种种改革的研究却不甚关心，尽管作为通史的一部分略有涉及，但除一、二个例子以外，始终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也就是说，关于建国初期50年代大学改革的详细研究论文，仅有邱雁、杨新的“解放初院系调整大事记”（1949～1953）（《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82年第4期，第199～214页）、邱雁的“关于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19～25页）以及北京师范大学苏渭昌教授（邱雁是其笔名）在《中国教育通史·第六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中撰写的有关内容。另外，50年代

台湾和香港出版的有关这一时期改革的著作只有钟石的《中共的高等教育》(友联出版社, 1953年)和李由农《共匪高等教育之研究》(阳明山庄, 中华民国四十六年)。但是, 港台的这两本书都是从反共思想立场出发, 观点偏激, 为批判而批判的言论比比皆是, 所依据的资料基本上出自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述研究现状无法与有关古代教育史以及清末民初教育史的丰硕研究成果相提并论。针对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笔者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才着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第2节 从对外关系看50年代中国的大学

享有悠久历史的中国, 教育史及大学史也可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最一般的定义是, 传授当时最高学问的活动称之为高等教育, 有效地实施这种活动的设施或机构称之为大学。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中国大学史的优秀著作,⁽¹⁾如果概观古代以来的“大学”历史, 可以认为, 自公元前5、6世纪的殷商时代, “大学”既已存在。但是, 与汉朝前的各种记载或汉朝以后学者的注释不同, 汉朝时期的太学作为正式的大学早已存在, 却是毫无疑问的。因此, 把汉朝的太学称为中国大学的起源, 也可认为公元前124年已有大学存在, 说明古代或近代之前的中国在各个朝代都确实存在着传授高级学问的可称之为“大学”的机构。从隋朝开始, 由于“人材选拔制度”科举的出现与兴盛, 使处于“人材培养制度”顶点位置的古代大学教育日渐衰落, 尤其是到明、清时期, 大学教育更是有名无实。

纵观中国古代以来的大学教育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 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几乎没有与外国进行过“接触”或“相互作用”。如果说受到外国影响的话, 除了唐朝玄奘就学于印度的

“那烂陀”并将所学成果带回唐朝之外，别无他例。中国自己构建的独特高等教育制度，反而对近邻的亚洲各国发挥着长久的影响。这正是萌发“中华思想”的原因所在，同时说明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处于世界中心的文化国家。

直到16世纪后半叶的明末，中国才与西方进行接触，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可算是先驱者。如果仅限于教育方面的影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中文名）（Giulio Aleni, 1582~1649年）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方教育制度。在其著作《西学凡》中，艾儒略首次将欧洲教育介绍到中国。当时，他“只是把科学与中国的儒学、科举联系起来，并没有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科举的弊害，丝毫没有伤害中国人的感情，”⁽²⁾以下是艾儒略解释的西方学术领域的分化状况与科举的关系。

- “一是文科，称为勒铎理加、Literarica（修辞学）”
- 一是理科，称为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哲学）
- 一是医科，称为默第济纳、Medicina（医学）
- 一是法科，称为勒义斯、Legies（法学）
- 一为教科，称为加诺搦古，Canonies（修士学）
- 一为道科，称为陡录日亚，Theologia（神学）”⁽³⁾

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依然是前者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中国不存在任何不得不依靠外国输入的商品，精神文化更是如此，例如，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国使节马嘎尼（Macartney）的诏谕便反映了这一点。⁽⁴⁾但是，近代之后，这种关系却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中国历史上的近代，即1839年（中国通常称1840年——译者注）鸦片战争之后，很快形成了所谓“先进西洋、落后中国”的基本格局。为了挽救在太平天国、“阿罗号”事件、中日甲午战争等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中日趋衰落的清朝统治体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部分开明官僚发起洋务运动，将创办通晓“西文”即外语、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教育机构与创办

“西艺”即培养通晓战争中所需的以炮舰、兵器为主的西方先进知识，机器与科学技术人才的教育机构作为近代化运动的重点。也就是说，中国从以往的“对外影响型”国家迅速转变为“接受外来影响型”国家。不过，为使“西学”的引入不与传统的儒教思想发生矛盾，必须建立特别的理论进行辩护。“中体西用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此种诡辩理论的代表。结果，中国的传统权威逐渐受到动摇，所谓欧化主义逐渐影响思想界和教育界，最终导致全面否定儒教权威，换句话说，虽然最终出现“全面欧化”的局面，但其过程决非是一帆风顺的。

洋务派在消除保守派的抵抗或障碍之后，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建立了以近代大学——京师大学堂作为最高层次的癸卯学制，这个学制随处可见日本学制的影响。此外，由于当时清政府聘请的外国教习被视为各国列强对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有效手段，因此，各国为输送本国教习去华展开了外交上的激烈竞争，这在史料中均有记载。⁽⁵⁾根据阿部洋的实证研究，中国最早的近代大学和学校制度等，“在19世纪后半叶以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模仿和引进外国教育的过程，其模仿对象，最初为日本，其次是德国，后又转向美国”⁽⁶⁾。阿部洋对清末至民初期间中国接受、模仿外国模式，作了详细的研究。

中外学者的一致看法是：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校制度在此之后直到解放为止，一直受美国模式的影响。50年代，苏联模式取而代之，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校制度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对于接受和模仿苏联模式，代表中国官方观点的《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对此下的结论是，“曾出现了结合中国的实际不够、生搬硬套的倾向”。⁽⁷⁾此外，目前中国广泛使用、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中国教育史教科书中也写道，“对苏联高等教育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缺乏认识”。⁽⁸⁾这些结论或评价是否妥当，苏联模式作为新的外来模式究竟是怎样被引入中国并深深影响着中

国教育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模式与中国的传统惯例或制度（包括那些更广泛地说从前是外来的，但现在已经深深融入中国制度中的制度在内），也可以说，与现有的传统制度、惯例、内容和方法等之间是何种关系或产生怎样的冲突？本书将尽可能进行缜密的研究，“从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比较”，⁽⁹⁾力求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为了进行影响关系研究或关系比较研究，具体的课题内容不同，选择比较的对象国自然也不同。就与本书的直接关系而言，既有适合于中日比较的问题，又有适合于中苏比较或中美比较的情况。在进行所谓的比较研究时，恐怕不是比较的对象国或地区越多越好吧。在没有明确的研究意图、对研究背景不甚了解或无任何研究假说的情况下，仅仅摆出不少例子或者根据对容易获得的统计数字的分析，便给它强加上某种价值，仅仅这样的研究不能称之为比较研究。本书的考察虽然与“比较研究”有区别，是常常关注一国问题的“一国研究”，但其基础却是中日、中美、中苏多国间的比较研究。

第3节 本书的结构与考察范围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关心，为了弄清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过程，本书由以下各部分构成。除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之外，作为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还存在着以广播、函授、夜大等多种形式为成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成人高等教育机构，这部分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列。

1. 废除旧机构

第1章考察欧美教会大学，即从欧美基督教及天主教教会等一些海外机构接受资金援助、解放前在中国开设的大学。第2章

考察解放区大学，即共产党解放区培养干部的教育机构。两者都是建国后在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不复存在的机构。当时，解放区大学是在得到积极的肯定中消亡的，也就是说，在新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而欧美教会大学却是在受到完全否定的评价下消亡的。但是，不容否认，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两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其影响的确仍然存在。因此，这两章将探讨虽已消亡，但为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建立奠定基础的两种类型的大学的发展历程。

2. 奠定新制度的基础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突出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即综合大学少，单科大学多；“重理轻文”；中央和地方各部委“部门办学”，所属关系复杂。第3章的“院系调整”，是指对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调整，通过调整确立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框架。第4章论述中央各部门办学的起源与形成过程。通过这两章的考察，将力求弄清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基本框架之确立过程。

3. 课程与教师

第5章和第6章论述微观教育方面的课程与教师问题。在此需要先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改革并不像构成本书各章节的内容那样循序渐进地展开，也就是说，课程改革和教师思想改造等，并不是在废除旧机构或奠定新制度的基础等改革之后再进行的。以后各章论述的内容也同样如此。从整体来看，本书考察的对象限定在建国前后至50年代前半期的短短时间范围内，这期间，很多改革是同时并举的。某种政治体制下将特定的教育内容或教师视为“反动”可能不足为奇，但是特定的制度或机构本身带有“反动性”，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却极其罕见。中国也是如此，对掌握政权的共产党而言，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消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

“反动”教育内容及对传授这些内容的教师采取适当的对策。因此，真正进行课程改革或对教师思想进行改造暂且不说，但毫无疑问至少在执政者改革日程表上是处于优先地位的。

4. 入学、毕业与对学生的资助

第7章之后的各章，均以高校的学生为中心，阐述各种制度的变化。即入学考试、就业、奖学方法以及寄宿制。可以说涉及到教学过程以外与学生有关的主要方面。前面已将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归纳为3点，至于高等教育组织管理的特征，则表现为“统一性”、“免费制”和“住校制”。中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都表现为统一性，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和毕业生统一分配便是突出的例证。此外，与初等、中等教育有偿收费不同，高等教育实行免费制度，而且，还以“人民助学金”的形式对几乎所有的大学生提供生活补助，这与日本等国正好相反。虽然宿舍面积不大，但全体学生都在校住宿，这也表现出高等教育的独特性。各章对上述特征的起源及由来进行探究，并阐述其意义所在。

通过以上各章的考察，可能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对构成其雏型的各个方面做出全面的论述。但是，必须指出，本书不足之处是缺乏对财政的论述。在若干章中，对与该章内容有关的经费虽做了必要的论述，但却没有正面论述财政的结构，阐明其具体的经费预算制定和执行情况。这完全是因为缺乏相关的资料。也可以说是因为笔者缺乏搜集相关资料的能力或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够，不过，相关资料是否还存在本身就令人怀疑。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对建国初期的教育预算或经费流向会有明确地进行实证的学术论文问世。

[注]

(1) 熊明安编《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487页及熊明

安教授的专著《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613页。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63页等都是论述古代以来大学历史的优秀著作，但完全或几乎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大学教育的发展进行论述。

- (2) 多贺秋五郎《中国教育史》，岩崎书店，1955年，第113页。
- (3) 同上书，第114~115页。
- (4) 马嘎尼著、坂野正高译《中国访问使节日记》，平凡社，1975年，第328~330页。伯特兰德·拉塞鲁也提到此诏谕，对这一时期中国—西洋列强的关系作了解说（牧野力译《中国的问题》，理想社，1970年，第58~62页）。
- (5) 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为例，阐述有关派遣教习工作的论文请参阅，大塚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与服部宇之吉”，《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115集，1988年，第45~64页。
- (6)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近代学校制度的成立过程》，福村出版，1993年，第251页。
- (7)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80页的“总述”部分。
- (8) 高奇编《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06页。
- (9) 石附实《出现在世界的日本的教育》，教育开发研究所，1992年，第133页。石附实教授将这一方法简称为“关系比较”，与“并置比较”一起在比较教育史上划分为两个课题领域，强调其重要性。“关系比较”多少有不习惯之感，但著者本人是完全同意这一看法的。

第1章 欧美教会大学的消亡

今天，到北京大学访问的外国客人，多半会被领到校园中央、外观别致的招待所去。这就是建在俯瞰“未名湖”小山坡上的“临湖轩”。实际上，这幢建筑是被毛泽东形容为美国对华“侵略政策完全失败的象征”⁽¹⁾——司徒雷登驻华大使（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年）就任大使前，在名牌私立大学——燕京大学担任校务长时的长期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对大学组织结构进行根本改造的过程中，燕京大学的所有设施、组织机构和人员，包括临湖轩在内，都被分散、合并到上述提到的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政法学院等院校中去，其校名也在中国不复存在。

但是，除临湖轩之外，今天中国的著名大学还随处可见以前由欧美基督教及天主教教会各派、财团等提供资金援助、进行管理的私立大学的痕迹。这些欧美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发挥了极其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尚未完全形成的时期，它们代替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发挥了培养人才的作用。那么，这些欧美教会大学是如何走向消亡的呢？本章的目的就是要弄清这个问题。为此，本章将欧美教会大学从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建到建国后消亡的过程同当时社会局势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在新政权下，作为旧大学典型代表的欧美教会大学之变化、解体以至消亡的过程，反而是新大学即目前高等教育制度的原型之形成过程。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探讨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时，这一过程研究也是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再进一步而

言，今天的中国在同欧美各国交往日盛、教育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过程中，也与以往欧美教会大学的办学机构进行接触和交流，⁽²⁾有关这些欧美教会大学的问题，也决不能仅仅像对待过去的事物那样来进行处理。

第 1 节 抗战胜利后欧美教会大学的重建 与解放初期的欧美教会大学政策

1. 抗战胜利后重建时期的欧美教会大学

由于日本战败，从柳条湖事件（即九·一八事件——译者注）算起长达 14 年、从芦沟桥事件算起长达 8 年的战火终于平息。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阐明的那样，⁽³⁾战争中，为了逃避战火和撤离日军占领区，许多教育机构迁到内地。欧美教会大学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建和重新开课，虽然各校情形不一，但总的来说，在战争中未从原来的所在地迁走而坚持开课的大学与疏散到内地的大学之间，悬殊很大。前者包括辅仁大学、津沽大学（天津）、华西协合大学（成都）、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以及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等（以上均在上海），这些大学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建工作比较顺利。例如，辅仁大学在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一直未停课，也未从北平迁往别处，因此在 9 月 6 日就早早地开始 1945 年度第 1 学期的授课，当时共有学生 2271 名。⁽⁴⁾在重新开学之前，以前入狱、或逃离日军占领地前往国统区的大学有关人员，如，英千里教授、教育学院张怀院长、沈兼士教授、克劳斯教务长等相继返校。1942 年秋以研究对日政策为目的而设置的日本语言文学系被停办，该系学生在办理转系手续的同时，细井次郎原校务长首席秘书和十几名日本教员回国。⁽⁵⁾

1946 年 2 月，辅仁大学第 2 学期开学，当时注册学生 2067

名,另外,还有40名驻华美军来校借读。⁽⁶⁾可以说反映了时代的特色。1946年,为了加快抗战胜利后重建工作步伐,并从事指导工作,同年8月,当时最大的后援机构天主教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 或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派遣哈罗德·芮哥尼神父(Rev. Harold Regney)就任新的校务长。如后所述,正是这位神父,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建工作之后,紧接着辅仁大学便转为国立、进而发展到停办的整个过程中,代表教会始终与中国当局针锋相对。⁽⁷⁾9月,辅仁大学新学期开始,学生有2348名,另有35名研究生。⁽⁸⁾从新学期开始增设了农学系,同时充实医学部预科,筹办医学院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然而,最终未能如愿。

另一方面,疏散到其它地方的大学,抗战胜利后的重建工作首先便是将学校迁回原址。在同一个省内搬迁,搬迁距离较短的岭南、以及沪江、东吴、燕京(暂时在北平和疏散地成都这两个地方恢复上课)等各大学于1945年10月早早就恢复上课,这可算是例外的情况。其它大学直到1946年才开始搬迁,回到原校址后便恢复上课。各大学复课的时间如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46年3月)、福建协和大学(1946年5月1日)、武昌华中大学(1946年秋)、之江文理学院(1946年秋。但是,一、二年级学生在杭州复课,三、四年级学生在上海复课)、齐鲁大学(直到1947年夏,原先疏散到成都的各系继续在当地上课。同时,在济南招考1946年度医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的新生。1947年10月,全体师生员工回到济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46年9月)、金陵大学(1946年9月30日)等。

战争刚刚结束,交通、运输工具极其缺乏,各校回迁和战时疏散到内地时一样困难重重。加之,大学战时疏散是分为几个阶段进行的,而往沿海各省的回迁则定于1945年秋统一行动。而且也并非仅仅大学有关人员希望搬迁,其它方面的机构也需要搬迁。当然,政府机关和军队在回迁上有优先权。例如,疏散到成都的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如果按照教育部的原来计划，由水路返回南京，至少要等到 1946 年 10 月，结果，该学院自己租用卡车，随后乘坐火车和汽车，约用 20 天时间返回南京。⁽⁹⁾有的大学急中生智乘筏返回原址。例如，福建协和大学从位于福建省内陆的邵武迁往福州时就是沿闽江乘筏而下。虽然最终还是抵达目的地，但由于竹筏倾覆，途中数人丧命，大批器材丢失，损失巨大。⁽¹⁰⁾

好不容易迁回原址后，欧美教会大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尽管各校遭受损失的程度不同，但不管怎样，最紧要的工作是修复遭受战争破坏的校舍和设备以及整理图书等。抗战胜利后像这样的恢复重建工作需要大批资金，为此，各校纷纷创办、管理大学的教会、财团或姐妹校、毕业生等国内外团体及个人等募捐。例如，管理基督教教会大学事务的在华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1945 年至 1948 年间，为其所管各大学的恢复重建工作，共支出 324 万美元以上。⁽¹¹⁾

表 1-1 欧美教会大学在校生数（单位：人）

| 大学名 | 1931 年 | 1947 年 |
|--------|----------|--------|
| 金陵大学 | 537 | 1084 |
| 燕京大学 | 549 | 901 |
| 辅仁大学 | 548 | 2385 |
| 岭南大学 | 284 | 1056 |
| 东吴大学 | 401 | 1626 |
| 沪江大学 | 545 | 1064 |
| 圣约翰大学 | (教育部未登记) | 1865 |
| 武昌华中大学 | 74 | 537 |
| 华西协合大学 | (教育部未登记) | 1784 |
| 齐鲁大学 | 325 | 442 |
| 福建协和大学 | 174 | 587 |
| 震旦大学 | 199 | 1241 |
| 天津沽大学 | (教育部未登记) | 761 |

续表

| 大学名 | 1931年 | 1947年 |
|-----------|----------|-------|
| 北平协和医学院 | 101 | 69 |
| 铭贤学院 | — | 247 |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 192 | 440 |
| 之江文理学院 | 221 | 889 |
|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 (教育部未登记) | 222 |
| 求精商学院 | — | 123 |
|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 12 | 88 |

(注) 根据《第1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教育统计)第34~39页及《第2次中国教育年鉴》第650~792页

抗战胜利后,欧美大学的重建工作到底没有白努力,如表1-1所示,抗战胜利后,这些院校的在校生数远远超过抗战前的规模。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各大学积极努力恢复重建工作时,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至。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和平的日子稍纵即逝。1946年7月,国共两党由以前的局部军事冲突,终于演变成全面内战。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从美国获得大量援助,同时,一方面向民众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另一方面还大量发行纸币,以弥补内战需要的财政支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推算,美对华援助达20多亿美元,约一半用于军事目的。⁽¹²⁾此外,中国国内的纸币发行量,从1945年末的2兆元上升到1946年7兆元,1947年春上升到14兆元,同年7月进一步上升到16兆元。⁽¹³⁾其后果自然引起物价飞涨,例如,1948年1月,在上海使用法币150万元可购大米50公斤,同年8月,就需6500万元,仅仅半年多一点时间,价格竟上涨40多倍。⁽¹⁴⁾

在无止境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面前,从海内外募集来的捐款也难以使教会大学摆脱财政窘迫的困境。1947年11月,齐鲁大学教师工资的支付办法便如实地反映了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即除